

## 关于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及版本源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近年刊布的天津图书馆藏《总目》残稿，使学界得以了解此书后期修订过程的若干关键环节。通过对相关修订内容及馆臣批语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推断该稿本很可能是乾隆五十一年为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是专供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它来审读刻本清样时使用的。后来《总目》的刊刻因故中辍，但四库总纂官仍继续在这个稿本上进行修订工作，目前可考的修订内容，至少已晚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学 纪昀 稿本 天津图书馆

### 一、现存的几种《四库全书总目》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之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六十年殿本、浙本先后刊行，历时二十余年之久。此书的纂修过程及其版本源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人们普遍以为刊刻于乾隆六十年之浙本是以早于它若干年问世的殿本为底本的，直至近20年来，这一误解才得以澄清。崔富章先生的研究表明，殿本、浙本几乎是同时刊行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sup>1</sup> 但就《四库全书总目》版本问题之复杂性而言，毋宁说这只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开端。

《总目》的正式刊行虽然很晚，但早在它问世前若干年，就先后出现过随《四库全书》入藏七阁的多种写本，其中北四阁写本最初可能入藏于乾隆四十八年，后来由于《总目》内容的变化又更换过新的写本，南三阁写本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后陆续入藏的。此类写本今天仍能看到两部残本，一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写本，今存27卷（其余各卷为光绪间丁丙补抄）；一是天津图书馆所藏文溯阁写本，今存143卷。这两种残本内容十分近似，据我估计，应该都是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的抄本。崔富章先生用

---

\*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与朱玉麒教授及苗润博、邱靖嘉、陈晓伟、任文彪、赵宇诸君往复切磋，获益良多，谨此铭谢。

<sup>1</sup> 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1992年，第159—173页；《〈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4—108页。

文澜阁写本与浙本、殿本分别做了比较，认为它才是浙本真正的底本。<sup>1</sup> 然而夏长朴先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他举出许多浙本与殿本相同，而与文澜阁或文溯阁抄本不同的例证——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浙本和殿本有五种提要不见于文澜阁和文溯阁抄本，而后面两种四库抄本则有十种提要不见于浙本和殿本。基于这一发现，他认为文澜阁与文溯阁抄本应源自同一底本，而浙本和殿本则属于同一版本系统。尽管如此，他仍倾向于认为浙本可能是以文澜阁抄本为底本，但在刊刻时可能还根据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四库馆臣的某一传抄本进行过校订。<sup>2</sup> 文澜阁抄本与浙本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无疑是夏文最有价值的一个发现，但遗憾的是，最终他仍止步于前人的结论。

如果说文澜阁写本和文溯阁写本主要有助于探讨《总目》的版本源流的话，那么现存的多种《总目》稿本则对于我们研究此书的编纂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为前者毕竟只能反映《总目》某一阶段的版本面貌，而后者却可以将馆臣的修订过程及细节真实地呈现出来。近30年来，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的若干种《总目》稿本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已成为四库学中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尤其是近年天津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本和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影印出版，更是为学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研究条件。目前已知的稿本共有五种，就稿本年代而言，几乎覆盖了从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末年《总目》编纂的各个阶段。通过研究这些稿本，我们可以对《总目》长达二十余年的编纂过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下面首先对这五种稿本的基本情况及其已有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回顾。

#### （一）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

这是一部长期以来罕为人知的《总目》早期稿本。现存48册，共计1790篇提要。封面题“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各部首册首页分别贴有“初次进呈抄录经（史、子、集）部”的笺条。版心标明某部某类，各书全按时代排序，未分别著录与存目，亦不分卷，且无页码。提要体例很不统一，颇多误字、讹字，与后来成书的《总目》以及诸阁本书前提要均有明显区别。

该稿本已于近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sup>3</sup> 并由台湾大学中文系

---

<sup>1</sup> 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第152—159页。

<sup>2</sup> 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于殿本”说的再检讨》，《台大中文学报》第40期，2013年3月，第249—290页。

<sup>3</sup>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台北商务印书馆，2012年。

夏长朴教授对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夏氏先是根据稿本的内容判断这有可能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继而又根据陈经《尚书详解》条下标注的“庶吉士汪如藻家藏本”，以及丁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条下标注的“侍读纪昀家藏本”，认为此稿本的编纂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间，而似非三十九年七月的初次进呈本。<sup>1</sup> 虽然对于该稿本的具体编纂时间目前还难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可以肯定它确实反映了《总目》早期稿本的基本面貌，其内容最接近于提要分纂稿。

### （二）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总目》初稿完成前后形成的一部稿本。今存一百二十三卷，线装二十四册，其中经部四册、史部四册、子部十册、集部六册。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工楷誊写，字体不一，当为数人所抄。提要中多有馆臣删改之处，或墨笔，或朱笔，从笔迹来看，亦非出一人之手，除纪昀外，可能还有陆锡熊、张羲年等人。该稿本页码多不连续，根据页数的颠倒、脱漏等情况来判断，似乎原稿曾被拆散，后又被人重新整理装订成册，书脑中原先已有的穿线洞眼亦可证实这一判断。

最早研究此稿本的是沈津先生，但他对稿本年代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笼统地说，“可以肯定，此残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后来之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sup>2</sup> 后来崔富章先生对此稿本的年代进行了进一步考订，指出稿本中收录有五种尹会一的著作提要（均有墨笔标注“毁”、“删”等字样），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尹嘉铨为其父会一请谥而引起的一桩文字狱，导致尹氏父子的所有著述均被列为禁书，由此判断，此稿本当是是年二月成书进呈的《总目》初稿或其副本；至于稿本的修订时间，崔氏认为当在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间，其理由是：稿本中的某些提要修改稿与乾隆四十七年抄讫的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相同，又周亮工《闽小纪》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被列入禁毁书目，而此稿本中的《闽小纪》提要并未批“删”、“毁”等字样。<sup>3</sup> 崔氏关于此稿本抄写年代的考订结论应该问题不大，但其修订时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部稿本的年代与上图残稿相同，反映了初稿完成前后的《总目》面貌。今存十六卷，线装三册，均属史部。此残稿系1961年北京琉璃厂一

---

<sup>1</sup> 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年6月，第165—198页。

<sup>2</sup> 以上皆见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33—177页。

<sup>3</sup> 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59—166页。

书贾处购得。书款格式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完全相同，而国博所藏卷次恰为上图残稿所缺，且两个稿本的天头部分都被切去一部分，以致部分眉批已失全貌。从这些迹象来看，这两部残稿原本应该是出自同一部书稿。

黄燕生先生首先向学界介绍了这部残稿的情况，并对其文献价值进行评估。关于稿本的抄成年代，据他判断，应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第一次进呈之后，四十六年二月第二次进呈之前。其理由有二：第一，各书皆已注明版本来源，其中有若干种书注明为浙江巡抚三宝、江西巡抚海成、江苏巡抚萨载等采进本（后来的《总目》通行本均已删去这些人名），此三人的就职时间最晚在乾隆四十年十月，去职时间最早在四十一年三月，由此推断，这部分残稿当抄成于乾隆四十年秋至四十一年春；第二，《尚史》一书注明为“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后出的殿本则作“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纪昀于乾隆四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十七年改兵部侍郎，可知这条提要的抄写时间当在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之间。<sup>1</sup> 这一考订结论似可斟酌。首先，《总目》稿本的抄写时间与各条提要的撰写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其次，注明“浙江巡抚三宝采进本”只能说明此书是三宝任浙江巡抚时所进呈，并不表明撰写提要时三宝仍在浙江巡抚任上。根据此稿本与上图残稿的关系来判断，它也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

另外，辽宁图书馆亦藏有《总目》残稿一卷（卷一〇三），据称可能也是与上图残稿出自同一部书稿。<sup>2</sup>

#### （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总目》编纂后期留下的一部稿本。今存六十三卷，线装四十八册。其中经部十三册凡十八卷，史部十七册凡二十四卷，子部五册凡七卷，集部十三册凡十四卷。无卷首、目录、凡例。首尾无钤印，行间多修改字迹。<sup>3</sup>

一般认为，此残稿反映了《总目》编纂后期的面貌，与殿本之间具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崔富章先生明确指出，此系乾隆五十七年后四库馆的修订稿本，其底本与文澜阁写本相同，修订部分则与武英殿刻本相同，并进

---

<sup>1</sup> 黄燕生：《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再发现》，《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199—219页。

<sup>2</sup> 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60页。

<sup>3</sup> 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第121—128页。

而推断此稿本实际上就是乾隆六十年刊刻殿本时所采用的底本。<sup>1</sup> 但根据王菡教授将稿本中的修订文字逐一与浙本进行比对的结果，发现其中约有77%已为浙本所吸收，而另外23%的修订文字基本与殿本相同，浙本则仍沿用其底本文字。<sup>2</sup> 这种情况说明，浙本和殿本的底本都脱胎于这一稿本，只不过在浙本的底本入藏文澜阁之后，这一稿本仍在继续修改之中，因此惟有乾隆六十年付刊的殿本才能反映《总目》的最终修订结果。

#### （五）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这是近年刊布的一部《总目》稿本（以下简称“天图稿本”），版本年代尚有待研究。此稿本线装六十册，存七十九卷，其中正文七十卷：包括经部十七卷，史部九卷，子部十七卷，集部二十七卷；另有卷首圣谕、御制诗文七卷，凡例一卷，目录一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朱丝栏，单鱼尾。上书口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鱼尾下依次为部类名及卷次、页码。版框尺寸：高21.7cm，宽15.5cm。行间及眉端有不少墨笔涂改文字，还有一些裁割粘贴的书页。此稿本原为清宫旧物，1977年7月28日由故宫博物院划拨给当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今天津图书馆），但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直至近年有机会影印出版，才开始引起人们关注。<sup>3</sup>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先生为此书影印本所写的前言，主要就这部稿本中所见馆臣修订文字及其文献价值做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认为稿本中的修订墨迹皆出自纪晓岚之手，并据此将影印本命名为《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这种说法可能还值得斟酌。稿本中确有部分涂改墨迹似乎是纪晓岚的手迹，但也不难发现一些笔迹迥异的批注文字，据此判断，可能曾有不只一位四库总纂官参与了此稿本的修订工作。

关于这部稿本的抄写时间及修订年代，影印本前言中并没有涉及。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前人早已有所关注。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曾提到他见过的一种《总目》写本：“民国十年秋，余得四库馆精缮提要底本六十册，不全，中有纪昀涂改笔迹，所改多与今本同，而凡遇周亮工名，必行涂去，审为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删改之底本。”<sup>4</sup> 今以陈文所引该稿本与

---

<sup>1</sup> 参见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61页。

<sup>2</sup> 参见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第126页。

<sup>3</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有关该稿本的介绍详见李国庆《影印纪晓岚删定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第1—21页。

<sup>4</sup> 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原载故宫博物院《文献论丛》，1936年10月；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49—58页。

天图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见即为此残稿，且称该稿本六十册，亦与天图稿本相吻合。周亮工文字狱案起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故陈垣先生因该稿本中屡见讳改周亮工名字的墨迹，遂断定它是乾隆五十二年以后进行修订的稿本。近来台湾学者夏长朴先生则根据类似的理由对它的抄成时间有一个初步判断，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于殿本”说的再检讨》的一条注文中谈及天图稿本的年代问题，认为此稿本形成的确切年代尚待研究，但从其底本有周亮工《书影》、《赖古堂诗集》，以及馆臣屡以墨笔删除李清、周亮工等人文字的迹象来看，稿本的抄成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李清文字狱案发生以前。<sup>1</sup>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来说，天图稿本无疑具有十分丰富的文献信息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而目前对它的版本由来以及修订年代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本文将在此稿本所提供的文献信息的基础之上，参考有关纂修《四库全书》的档案资料以及《总目》其他稿本、刻本的内容，力图弄清这一稿本的来龙去脉。

## 二、天津图书馆藏《总目》残稿的抄写年代

在讨论天图稿本的抄写年代之前，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需要加以解释。笔者发现，此稿本今存正文七十卷中，有四卷显系其他抄本阑入，即卷七七史部三十三（地理类存目六）、卷一三六子部四十六类书类二、卷一三七子部四十七类书类存目一、卷一五一集部四别集类四。此四卷与其他各卷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一是行格、版心、页码皆无；二是笔迹迥然有别；三是抄写多有错漏，如卷七七史部三十三下一行即漏抄了“地理类存目六”；四是除了抄写错漏处径行涂改外，未见有任何修改墨迹。

笔者将以上四卷提要与殿本进行了比勘，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内容高度吻合。惟有卷七七的情况较为特殊，此卷共收入七十九篇存目提要，包括地理类古迹之属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地理类杂记之属四十二部一百七十六卷。天图稿本该卷各书书名、作者、卷数以及各书所注版本，皆与殿本完全吻合，但中间部分的排列顺序却出现了严重的颠倒错位，导致古迹之属和杂记之属互舛。根据殿本各书的序次，可以看出天图稿本是如何错乱的：自429页《江心志》至438页《鹅湖讲学会编》应接在406页《崇恩志略》之后，自417页《豫章今古记》至422页《秦录》应接在438页《鹅湖讲学会编》之后，自407页《晋录》至416页《帝京景物略》应接在422页《秦录》之后，自424页《山左笔谈》至428页《山东考古录》应接在416

---

<sup>1</sup> 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浙本出于殿本”说的再检讨》，第263页。

页《帝京景物略》之后，自423页《京东考古录》至424页《天府广记》应接在428页《山东考古录》之后。<sup>1</sup>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颠倒错乱的现象，猜想是由于此卷原无页码，故极有可能是收藏者装订时出现错页造成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这四卷抄本的来历，估计它们本是乾隆末年某位馆臣或藏书家据殿本之底本私下转录的一个本子，后来不知何故被掺入天图稿本之中。在乾隆六十年殿本、浙本刊行之前，这类抄本颇为流行。如胡虔乾隆五十八年据《总目》抄本刊行《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十卷，在为此书所作的跋中说道：“辛亥（即乾隆五十六年）三月，虔在武昌节署得恭读《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书凡二百卷，……力不能缮写，又正目已有知不足斋刻本，乃录其存目校而藏之。其尚有钞胥字画之误，壬子在江宁，与凌仲子廷堪复详校之，并厘为十卷云。”<sup>2</sup>周中孚为此书所作提要亦云：“曾见《存目》旧抄本，系照馆中初编之稿录出，与是本无异，知雒君（按即胡虔字）即据初稿本编定付刊，故与沈提要刊本不同。”<sup>3</sup>可见胡虔所据为底本的《总目》，就是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抄本。

如上所述，既然判定上述四卷提要本不属于天图稿本的内容，下文讨论该稿本的抄写年代及文献价值时，自然要将它们排除在外。

关于天图稿本的抄写年代，首先需要明确它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前面提到，陈垣先生根据稿本中涂改周亮工名字的墨迹断定它是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修订本，夏长朴先生则以类似的理由推断它的抄写年代当不晚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由于乾隆五十二年发生的李清、周亮工文字狱所提供的线索，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判断该稿本抄写的时间下限。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天图稿本卷五〇史部别史类有李清《南北史合注》，馆臣对这篇提要先后做过两次处理。该书卷数，底本原作“一百五卷”，后被墨笔涂改为“一百九十一卷”；提要中“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大学士春芳之元孙”一句被删去。这是第一次修改留下的痕迹。另外，在此条提要上端又贴有一浮签，上有墨笔批注：“《南北史合注》已撤去，此提要应删。存查。”这

---

<sup>1</sup> 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七七，第4册，第387—458页。因天图稿本此卷原无页码，故此处所标注者皆为影印本页码。

<sup>2</sup> 胡虔：《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跋，光绪十年学海堂刊本，叶1a-b。按“正目已有知不足斋刻本”云云，系指乾隆四十九年鲍氏知不足斋所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sup>3</sup>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第150页。

显然是第二次的修改意见。<sup>1</sup>

李清文字狱案发生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资料对此事原委有详细记载：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sup>2</sup>

此事之起因，是高宗在抽查四库馆所进呈的南三阁库书时，发现李清《诸史同异录》以顺治皇帝与崇祯皇帝妄加比拟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狱，李清的所有著作均遭禁毁。同年四月二日《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理情形片》透露了此中的消息：“此次所毁李清书四种，其《南北史合注》一种，系在史部别史类中；《诸史同异录》及《不知姓名录》二种，系在子部类书类中。此二类备抄之书尚多，均可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次补入，不见抽换之迹。惟《南唐书合订》一种，系在史部载记类中，此类书籍甚少，现在别无备抄之书，无可补入。”<sup>3</sup> 天图稿本中的《南北史合注》提要被馆臣贴签删除，就是此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既然该稿本底本中尚有《南北史合注》，<sup>4</sup> 那就说明此稿本的抄写时间不应晚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如考虑到此篇提要在李清文

---

<sup>1</sup> 该书虽已于乾隆五十二年被撤出《四库全书》，但其底本仍留存于故宫，中华书局影印浙本《总目》时，将该书书前提要辑入《四库撤毁书提要》。提要中仍有“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大学士春芳之元孙”一句，与天图稿本底本相同，而卷数则已改为一百九十一卷。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下册，第1839页上栏。

<sup>2</sup> 《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纂等交部议处》，军机处上谕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1991—1992页。

<sup>3</sup> 《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理情形片》，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997—1998页。

<sup>4</sup> 按天图残稿中所见李清著作仅有此书，《南唐书合订》当在卷六六史部载记类中，但此卷今已不存；《诸史同异录》和《不知姓名录》当在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中，天图稿本虽有此卷，然系其他抄本阑入，故亦未见此二书提要。这种情况也可进一步证实笔者上文的判断，即那四卷未见修订墨迹的抄本应该出自乾隆末年。



字狱案发之前已经做过第一遍文字修改，则其抄写时间似应更早。

天图稿本的抄写年代上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中卷首和《凡例》有一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关键性信息，将会给我们判断其生成年代造成很大困扰，因此需要做一番认真的考索。

此稿本除了凡例和目录之外，还有卷首凡七卷。其中卷首之一为“圣谕”，共收入二十四篇上谕，时间自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至四十六年十一月，仅比浙本少一篇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上谕；卷首之二至之六为“御制诗”五卷（影印本目录将卷首之六“御制诗”误为“御制文”），各诗作年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卷首之七为“御制文”一卷，作年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卷御制诗文仅见于天图稿本卷首，而不见于晚出的殿本和浙本，不免令人感到蹊跷。

那么，天图稿本卷首所载御制诗文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当《总目》初稿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后，高宗曾就此书的编纂体例提出如下修订意见：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总目提要》内，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恭载列圣钦定诸书及朕御制、御批各种。所拟殊属纷繁。……朕意如列圣御纂诸经列于各本经诸家之前，《御批通鉴纲目》等书列于各家编年诸书之前，五朝圣训、朱批谕旨、方略等书列于诏令诸门之前，《御注道德经》列于各家所注《道德经》之前，其它以类仿照编次，俾尊崇之义与编纂之体并行不悖。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sup>2</sup>

---

<sup>1</sup> 此卷“御制文”最后一篇是《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维子集》卷首所载此谕，末题“乾隆辛丑孟春”，知作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

<sup>2</sup>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

高宗的这篇上谕主要针对《总目》的编纂体例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其一，不同意将本朝诸帝御撰、钦定之书冠于经、史、子、集各部之首的做法，主张改置于各门类之前；其二，不同意将他本人历年来为修《四库全书》所降谕旨以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均冠于全书之首，要求将卷首的六卷御制诗文撤出，列入集部的御制诗文集内，并分别冠之于所题各书之首，而《总目》卷首只保留历年修书谕旨以代弁言。

然而对于上述修订方案，高宗经反复考虑后，觉得仍有不妥，于是两天以后他又针对《总目》的编纂体例颁降了第二道御旨：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朕一再思维，《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如经部易类，以《子夏易传》冠首，实为说易家最古之书，允宜弁冕羲经。若以钦定诸书列于各代之前，虽为纂修诸臣尊崇本朝起见，而于编排体例，究属未协。况经、史、子、集各部内，尚有前代帝王论著，以本朝钦定各书冠之，亦有未合。……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则体例精严，而名义亦秩然不紊，称朕折衷详慎之至意。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sup>1</sup>

在这篇上谕中，高宗对他此前提出的第一点意见进行了修正，认为本朝诸帝钦定各书不但不应冠于经、史、子、集各部之首，也不宜列于各门类之首，所有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均应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钦定各书可置于各门类本朝著述之前，这样才能使名义“秩然不紊”，可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

遵照高宗的旨意，四库馆臣对《总目》初稿从编纂体例到提要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是月十九日永瑆等人的一封奏折谈到了《总目》的修订情况：“《总目提要》业于上年办竣进呈，荷蒙圣训指示，令将列圣钦定诸书及御制、御批各种，均按门类分冠本朝著录各书之上，毋庸概列部首。现在亦已将体例尊奉改正，另行排次，仍编成二百卷，装作二十函，谨一并覆进。”<sup>2</sup> 这封奏折明确指出，此次进呈

---

撤出》，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289—1290页。

<sup>1</sup> 《谕内阁所有四库全书各部俱各按撰述人先后依次编纂》，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290—1291页。

<sup>2</sup> 《质郡王永瑆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摺》，军机

的《总目》已按照高宗的要求调整编纂体例，御撰、钦定诸书均按其所属门类分置于本朝著述之前，但未说明《总目》卷首的六卷御制诗文是否也已删去。

前面谈到，天图稿本卷首恰恰就有六卷御制诗文，包括御制诗五卷及御制文一卷。根据上文所引档案材料得知，高宗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的上谕中曾明确要求将《总目》卷首的六卷御制诗文撤出，照理说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的修订本就不应再有这些内容。如此看来，似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图稿本正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

然而问题却比我们所想像的要更为复杂，请看天图稿本《凡例》第二条的说法：

列朝圣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愜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sup>1</sup>

这段话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即《总目》已经遵从高宗的旨意调整了编纂体例，原冠四部之首的御撰、钦定诸书，已被改置于各相关门类本朝著述之前。天图稿本各书提要的排序也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如卷一二经部书类二将康熙御定《日讲书经解义》等两种著作置于明人书之后、本朝书之前；卷四九史部纪事本末类将《亲征朔漠方略》等六种乾隆间奉敕修纂的官书皆列于明人书之后、本朝书之前；卷一九〇集部总集类五将《御选古文渊鉴》等十三种钦定著作皆置于明人书之后、本朝书之前。只有卷五五史部诏令奏议类是个例外，乃是将《太祖高皇帝圣训》等本朝诸帝诏令谕旨八种置于诏令奏议类之首，后面才是《唐大诏令集》等前朝诏令。对于这一排序原则，在本朝诏令八种之后有一段馆臣按语做了解释：“列圣御制及官撰诸书，并恪遵圣谕，冠于国朝著述之首。惟诏令奏议一门，例以专集居前，总集居后，而所录汉、唐诏令皆总集之属，不应在专集之前，是以恭录圣训、圣谕弁冕此门，前代诏令列后焉。”<sup>2</sup>可见这种情况属于特例，与高宗的要求并不相悖。上述事实说明，天图稿本确实已按照高宗的要求调整了编纂体例，因此它显然不可能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初

---

处原摺，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02—1603页。

<sup>1</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凡例”，第1册，第278—279页。殿本、浙本亦同。

<sup>2</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五五，第4册，第165—166页。

稿。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证据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其一，天图稿本卷首之一的“圣谕”，不仅已收入上文所引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的两篇上谕，还有三篇是时间更晚的，最后一篇已晚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六日，这些上谕自然不可能被收入是年二月的进呈初稿中。其二，天图稿本《凡例》开首称：“谨恭录御题诗文，分冠诸书之首。”<sup>1</sup> 即已将高宗御题四库诸书诗文分别冠之于所题各书之首，这显然是对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上谕的一个回应，说明此《凡例》应是四十七年七月以后的修订本。其三，上文提到，上海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极有可能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此稿本中收录有五种尹会一的著作提要，其中四种因天图稿本的相关卷次皆已不存，无从比对；惟上图残稿卷一八五集部别集类存目一二有尹会一《健余诗草》三卷，<sup>2</sup> 可取与天图稿本相比勘，然而却发现后者已无此条提要。尹会一的文字遭到禁毁是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以后的事情，天图稿本既已不收他的著作，可见也不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

如上所述，天图稿本《凡例》及卷首所载御制诗文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此稿本卷首仍有六卷御制诗文，照此看来，它理应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初稿；另一方面，天图稿本《凡例》又明确表示它已遵从高宗旨意对涉及御撰、钦定诸书的编纂体例进行了重新调整，且从各卷提要的排序来看，也全都符合这一原则，说明此稿本绝不可能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初稿！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剩下的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虽然高宗在《总目》初稿进呈之初，曾以上谕的形式明确要求撤下卷首的六卷御制诗文，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的修订本居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sup>3</sup> 据我估计，这六卷御制诗文被撤出《总目》卷首，大概已是乾隆五十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以上讨论旨在厘清天图稿本给我们提供的某些“似是而非”的信息，以说明它并非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总目》进呈初稿。在弄清楚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后，仍需重新探讨此稿本的抄写年代上限。

---

<sup>1</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凡例”，第1册，第277页。从这句话里看不出《总目》卷首的六卷御制诗文是否已经撤出。

<sup>2</sup> 参见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第176页。

<sup>3</sup>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似可理解为四库馆臣之曲意尊君。其实类似的现象并非孤例，早在四库开馆之初，高宗就要求御纂诸书“入于各类，不必冠之部首”（见陆锡熊《初拟办理〈四库全书〉条例》），而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的《总目》却仍以御纂、钦定诸书冠于四部之首。与此情况极为相似。

天图稿本的某些提要内容，向我们提示了一些初步的线索。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国朝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勅补绘。”<sup>1</sup>但何时成书时间不详，检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皆署“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据此推断，此条提要的撰写时间当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四十九年十一月之前。又卷五〇史部别史类《契丹国志》提要云：

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sup>2</sup>

这篇提要的内容与高宗乾隆四十六年的一首上谕有直接关系。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当第一份《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即将全部抄缮完毕之际，高宗抽阅《契丹国志》时发现了许多他认为非同小可的问题，其一是“体例混淆，书法讹舛”，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其二是“失君臣之体”，妄称胡安国之谥；其三是所谓“华夷之见”，称五代时劫父叛君的杨承勋为“变不失正”。于是馆臣遂请撤出此书，但高宗不同意采取这种简单的处置办法，遂于是年十月十六日下旨，要求重新改编《契丹国志》，“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sup>3</sup>很显然，天图稿本的《契丹国志》提要已经是根据高宗上谕重新撰写的文本，那么这篇提要又写于何时呢？这要结合《契丹国志》改纂成书的时间表来考虑。据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日的一件军机处上谕档记载说：“《契丹国志》改纂已竣，现在缮写正本进呈。”<sup>4</sup>这是改纂成书的时间。又据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一件军机处上谕档说：“遵查《契丹国志》于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谨将

---

<sup>1</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一四八，第6册，第273页。

<sup>2</sup>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卷五〇，第3册，第606—607页。此段文字天图稿本多有涂乙，笔者所引系其底本原文。

<sup>3</sup> 参见《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417—1419页。

<sup>4</sup> 《军机大臣奏各馆纂办未竣各书分晰开单呈览片》附《各馆纂办书籍清单》，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709页。

四库馆写出正本呈览。”<sup>1</sup> 这是正本抄缮完毕进呈御览的时间。而文溯阁、文津阁、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则分别题为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四十九年三月和四十九年十一月，这是诸阁库书抄缮完毕的时间。据此判断，《契丹国志》提要的重新撰写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前后，撤换《总目》原提要、抄入天图稿本当然更是在这之后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论证，可将天图稿本的抄写时间上限大致划定在乾隆四十八、九年，其下限最迟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当然，这只是根据上文的考订结果提出的一个初步时间框架，并非本文的最终结论。

### 三、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

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对于天图稿本的生成年代给出一个更加准确的结论呢？幸运的是，这个稿本上留下的某些四库总纂官批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其一，天图稿本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在《赖古堂藏书》提要处有一浮签，上有批注云：“《赖古堂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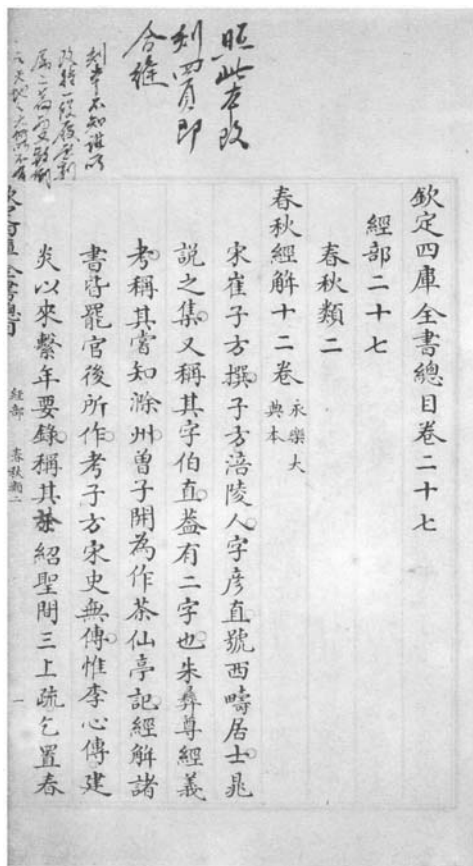
其二，天图稿本卷二七经部春秋类二有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提要，《春秋经解》提要眉端有馆臣批语：“照此本改刻四页即合缝。”其后又有笔迹相同的小字批语：“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见图一）此篇提要末有墨笔增补16字，上端有批语“（勾）出一行”；下一篇《春秋本例》提要多有修改，上批“勾出一行”；再下一篇《春秋例要》提要先是被墨笔勾去，后又有三角恢复符号，此篇提要亦多有修改，眉端批“勾出一行”，其后又有小字眉批：“共成四页零二行，与刻板合缝。只消挖板心一卷，不必全刻矣。”（见图二）<sup>3</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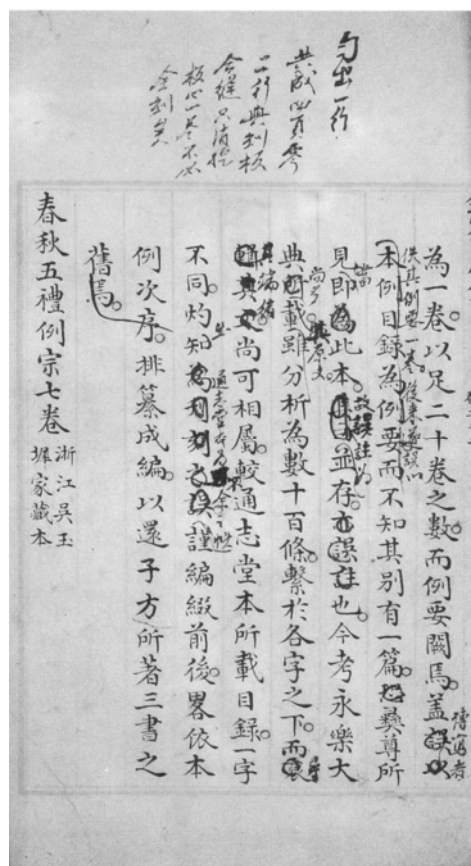
<sup>1</sup> 《军机大臣奏遵查〈契丹国志〉办竣情形并将正本呈览片》，军机处上谕档，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790页。

<sup>2</sup> 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5册，第552页。

<sup>3</sup> 以上皆见卷二七叶1a—叶4b，《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3册，第67—74页。



图一 《春秋經解》提要眉批



图二 《春秋例要》提要眉批

以上馆臣批语对于弄清天图稿本的来历至关重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馆臣批语中提到的“刻本”、“宋字刻本”等说法，上文说到，《总目》最早的刻本——殿本、浙本的刊行都已晚至乾隆六十年，故此处所谓的“刻本”，显然与殿本、浙本无关。不过有证据表明，在殿本、浙本问世之前，《总目》曾一度付梓，后又因故中辍。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在殿本《总目》刊刻完工之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曹文植曾给高宗上过一封奏折，其中说到：

臣曹文植谨奏，为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敬谨刷印装潢，恭呈御览事。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sup>1</sup>

另外，曹文植之子曹振鏞在为其父所作的行状中也说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四库全书总目》刊刻竣工，进呈御览。先是，先公于丙午年（按

<sup>1</sup>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曹文植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装潢呈览摺》，宫中硃批奏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74页。

即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仰荷俞允,后因提要有更改处停工未刻”。<sup>1</sup> 这一记载亦可从当时的档案材料中得到证实,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军机大臣在奏报禁毁李清著作事宜时提到:“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sup>2</sup> 说明此时《总目》正在刊刻之中,恰好可以印证曹文植的上述说法。

据曹文植说,他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并得到高宗允准,后因纪昀等奉旨覆校北四阁书,其中提要多有需要修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这应是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以后的事情。据我判断,天图稿本所见馆臣批语中提到的“刻本”或“宋字刻本”,<sup>3</sup> 应该就是指这一刻本。

那么,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总目》刻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前述天图稿本卷二七的馆臣批语做一认真分析。上文提到,该卷《春秋经解》提要眉批称“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云云,这里说的“履历”显然是指提要所述该书作者崔子方生平。《春秋经解》提要开端有一大段文字考证崔子方的履历:

《春秋经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集又称其字伯直,盖有二字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尝知滁州,曾子开为作《茶仙亭记》,《经解》诸书皆罢官后所作。考子方《宋史》无传,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其于绍圣间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书者三十余年。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大略相同。朱震进书札子亦称为东川布衣。彝尊之说,不知何据。惟《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一条云:“子方与苏、黄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黄庭坚称为六合佳士。”殆彝尊误记是事,故云然欤。

需要说明的是,天图稿本卷二七所载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提要,浙本《总目》与天图稿本底本相同,殿本《总目》则与天图稿本之修改稿皆同,而无论是天图稿本的底本还是修改稿,都仅有《春秋经解》提要谈及崔子方履历,后二篇提要则不再重复介绍作者生

---

<sup>1</sup> 曹振鏞:《先文敏公行状》,见曹文植《石鼓砚斋文钞》卷末,《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五年刻本,2010年,第387册,第197页下栏。

<sup>2</sup> 《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理情形片》,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998页。

<sup>3</sup> 所谓“宋字刻本”,在这里应理解为对刻本的一种泛称。



平，这与《总目》一书的体例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若将此三书提要与众阁本书前提要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点差异。首先是《春秋本例》的提要内容，两者明显不同。天图稿本《春秋本例》提要云：“《春秋本例》二十卷（内府藏本），宋崔子方撰。是书大旨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而文渊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皆曰：“《春秋本例》二十卷，宋崔子方撰。子方字彦直，涪陵人。为人介而有守，黄庭坚极称其贤。绍圣中，罢《春秋》取士，子方三上书乞复之，不报。其为是书也，大旨谓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乃列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例之。”<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秋经解》提要已对作者履历做过详细考证，但《春秋本例》一书的诸阁本书前提要仍然有一段介绍崔子方履历的文字，想必这应该反映了提要初稿的面貌，<sup>2</sup>而《总目》编纂过程中因对体例做过整齐划一的工作，故已将《春秋本例》提要中有关作者履历的文字删去。

其次是崔氏《春秋》三书的排列顺序，诸阁本与《总目》各不相同。《总目》的先后顺序是《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文渊阁本的顺序是《春秋经解》（附录《春秋例要》一卷）、《春秋本例》，文津阁本的顺序是《春秋本例》、《春秋经解》（附录《春秋例要》），文溯阁本的顺序是《春秋本例》、《春秋例要》、《春秋经解》。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皆将《春秋例要》作为《春秋经解》的附录，曾经引起过某些误会。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纪昀在向高宗奏报覆校文津阁全书结果时，提到发现的诸多问题，包括“遗失《永乐大典》书三部”，其中一部即为《春秋例要》，谓“此书宋崔子方撰，乃子方《春秋》三书之一。通志堂所刻经解，仅有两书，佚此一种，久无传本，主事杨昌霖从《永乐大典》辑出补完。今架上未收”云云，<sup>3</sup>就是因为《春秋例要》被

<sup>1</sup> 见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第345页下栏；《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商务印书馆影印本，2006年，第1册，第353页上栏；金毓黻辑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上册，第127页上栏。

<sup>2</sup>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确切的证据：《春秋本例》诸阁本书前提要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惟“大旨谓”三字，后者作“以为”而已（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经部第2册，第431—432页）。

<sup>3</sup> 《左都御史纪昀奏文渊阁书籍校勘完竣并进呈舛漏清单摺》附《遗漏抵换各书清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274页。按该书误将此《清单》附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奏摺后，其实原本应附于《礼部尚书纪昀奏来热勘书完竣并查明

附于《春秋经解》一书后，以致覆校时误以为此书辑本已经遗失。上文提到，天图稿本《春秋例要》提要先是被墨笔勾去，后又有三角恢复符号。大概也是因为馆臣在修订《总目》时，曾与文渊阁本或文津阁本进行核对，发现库书并无《春秋例要》一书，故一度打算将该书提要径行删去。

根据上文谈到的馆臣批语，同时考虑到崔氏《春秋》三书诸阁本书前提要与《总目》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可以对天图稿本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做出如下推断：这个稿本应该是乾隆五十一年为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当时可能同时抄了两部清本，一部用于刻板，另一部用于总纂官最后审定，而天图稿本就是后一个本子。估计当时的工作程序，应是一边刻板，一边刷出校样来供总纂官审定，天图稿本上留下的那些批语，正是总纂官纪昀等人针对校样中发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修改意见。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天图稿本卷二七的馆臣批语做出合理的解读。最关键的一段文字仍是见于《春秋经解》提要的那条眉批：“刻本不知谁所改，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据我估计，可能在该卷雕板之时，某位馆臣发现《春秋本例》提要没有介绍作者崔子方其人，也没有“子方有《春秋经解》，已著录”之类的话，而竟未注意到前一篇《春秋经解》其实已有作者履历，于是便用翰林院底本或某一阁本的书前提要替换了该书提要，并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两篇提要的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sup>1</sup>这样一来，《春秋经解》和《春秋本例》两篇提要遂重复出现作者履历，且两书先后顺序也与《总目》底本不同，故总纂官在天图稿本《春秋经解》提要眉端写下“将一段履历割属二篇，而又颠倒之”的批语，就是针对此事而发。

从天图稿本卷二七所见其他几段馆臣批语中，也可以看出它与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的关系。上文指出，《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篇提要均有若干增补修改的内容，且提要上方又都有“匀出一行”的眉批，《春秋经解》提要眉批要求“照此本改刻四页即合缝”，《春秋例要》提要眉批又称“共成四页零二行，与刻板合缝。只消挖板心一卷，不必全刻矣”。这些眉批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要求将这三篇提要增补修改之后多出的两行文字挤进此四页（即卷二七叶1a—叶4b）之内，这样只需重刻四页即可，而不必整卷都重刻。<sup>2</sup>

---

阙失颠舛各书设法办理摺》（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114—2115页）之后，乃是乾隆五十三年正月覆校文津阁全书的结果。

<sup>1</sup> 根据上文谈到的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的情况来判断，翰林院底本顺序可能也是《春秋本例》在前而《春秋经解》在后。

<sup>2</sup> 这些眉批中，惟“只消挖板心一卷”句颇为费解。或许是因《春秋例要》提要曾

综上所述，根据笔者对天图稿本所见馆臣批语所做出的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该稿本的来历，它很可能是乾隆五十一年为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是专供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它来审读刻本清样时使用的，故上面留下了若干针对刻本而提出的校订意见。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将天图稿本的抄写年代确定为乾隆五十一年。

#### 四、天图稿本所见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

不过，在对天图稿本的数百处修订文字及眉批进行逐一梳理之后，笔者发现它们并不都是针对乾隆五十一年刻本而提出的校订意见。实际上，天图稿本的修改内容及修订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有迹象表明，即便在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因故中辍之后，四库总纂官仍继续在这个稿本上进行《总目》的修订工作，且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因此，究竟哪些内容是总纂官审定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进行的校改？哪些内容是后来做的进一步修订？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需要加以仔细辨析。由于这个问题与《总目》初刻本的刊刻时间直接相关，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从乾隆五十一年开始刊刻的《总目》，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终止的？

上文提到，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军机大臣在向高宗禀报禁毁李清著作的情况时曾透露：“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sup>1</sup> 说明是时《总目》尚在刊刻中。又天图稿本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赖古堂藏书》提要旁有批注云：“《赖古堂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sup>2</sup> 这里说的“宋字刻本”即是指乾隆五十一年刻本，而周亮工著作遭到禁毁是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以后的事情，<sup>3</sup> 馆臣批注既称“宋字刻本已删”，说明此卷雕板已在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以后，故此条提要被删去未刻。这么看来，从乾隆五十一年开始刊刻的《总目》，直至五十二年八月尚未中止，且至少已经刻完134卷。

据曹文植说，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最后被叫停，是因为“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sup>4</sup> 所谓

---

一度被删去，批注者以为少此一页，则该卷后面各页板心页码均需挖改，故云。

<sup>1</sup> 《军机大臣奏遵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函商酌办理情形片》，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998页。

<sup>2</sup> 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5册，第552页。

<sup>3</sup> 见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谕内阁签出〈读画录〉等书违碍字句之详校官著交部议叙》，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057页。

<sup>4</sup>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曹文植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

“奉旨查办四阁之书”，是指乾隆五十二年内廷四阁全书的第一次覆校。是年五月，因高宗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讹谬甚多”，下令对北四阁全书进行全面覆校。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系由纪昀亲自带队前往热河覆校，始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才结束。<sup>1</sup> 据我估计，《总目》的刊刻之所以半途而废，大概就是在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文津阁《四库全书》覆校工作开始以后，纪昀发现提要中的错误太多，必须再做进一步修订，于是才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个已经刻完一多半的本子。

如上所述，《总目》之刊刻大约终止于乾隆五十二年冬，根据这一时间线索，大致可以将天图稿本中的修订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乾隆五十一年、二年间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底本审定刻本清样时提出的校订意见，另一类是乾隆五十三年以后总纂官在该稿本上所做的后续修订。下面拟选取典型例证，分别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修订文字加以区别和说明。

第一类修订内容主要是四库总纂官审定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提出的校订意见，除了上一节谈到的馆臣批语之外，还有不少是直接对提要进行增删的文字。如见于天图稿本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的明祝彦《祝氏事偶》提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此篇提要中的一段文字，在天图稿本底本和修改稿，以及后来的《总目》浙本和殿本中都各不相同（详见表一），从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历经多次修订的痕迹：

表一 《祝氏事偶》提要异文对照表

天图稿本底本	天图稿本修改稿	浙本	殿本
后来李清之《诸史同异》、周亮工之《同书》，其体实权輿于此。然（祝）彦采摘疏略，既不能及李、周二书之精密……	大致与后来周亮工之《同书》约略相似，而不能及周书之精密。	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	大致与同时陈禹谟之《骈志》约略相似，而不能及陈书之精密。

因李清、周亮工文字狱案皆发生于乾隆五十二年，故抄成于乾隆五十一年天图稿本尚无任何避忌，以《祝氏事偶》与李清《诸史同异》、周亮工《同书》相提并论；但天图稿本中有墨笔删改的字迹，经总纂官修改后的相关段落已将提及李清的内容予以删除，只保留“周亮工之《同书》”一句，可见此处之删改当是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李清文字狱案之后、同年

装潢呈览摺》，宫中硃批奏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74页。

<sup>1</sup>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0—210页。

八月周亮工著作遭到禁毁之前；后来浙本又改称方中德《古事比》，显然是忌讳周亮工的缘故；而殿本最终改作陈禹谟《骈志》，并非有何违碍，可能是觉得以方中德《古事比》加以比拟似有不妥。<sup>1</sup>《总目》对方中德《古事比》的评价并不高：“其书以古事之相类者排比成编，然征引虽博，挂漏实多。”<sup>2</sup>而对陈禹谟《骈志》的评价则胜过前者：“大抵简核不及赵崇绚之《鸡肋》，而博赡则胜方中德之《古事比》也。”<sup>3</sup>这样看来，浙本称《祝氏事偶》“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云云，确实是不大合适的。《祝氏事偶》提要的这段异文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仅就天图稿本的删改内容来看，可以肯定是四库总纂官审定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清样时所为。

因牵涉周亮工文字狱而进行的删改，在天图稿本中屡见不鲜。该稿本底本中有周亮工著作提要三种，其中见于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的《书影》，见于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的《赖古堂诗集》，均被总纂官用墨笔勾去；见于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的《赖古堂藏书》，有批语谓“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勾去，以归画一”云云。周亮工著作遭到禁毁是乾隆五十二年八月的事情，是时《总目》仍在继续刊刻中，由此判断，这些提要也应该是总纂官审读刻本清样时所作的删改。

第二类修订内容是乾隆五十三年以后纪昀等总纂官在天图稿本上所做的进一步修改。上文指出，《总目》的刊刻工程至迟到乾隆五十二年冬已经终止，但有确切证据表明，直至乾隆五十五年，该稿本仍在继续进行修订。

天图稿本卷四九史部纪事本末类卷末，补入了一篇另纸抄写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书眉上批注：“此篇补在《石峰堡纪略》之后，《绥寇纪略》之前。”其提要原稿曰：“《钦定台湾纪略》：臣等谨案《台湾纪略》□□□（此处留有三字空格）卷，乾隆五十三年奉勅撰。……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后用墨笔补写卷数，作“《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末句曾被墨笔涂改为“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恭校上”，后又删去此句（见图三、图四）。<sup>4</sup>李国庆先生认为，“此篇文字用另纸重新抄写，盖改动较大故也”。<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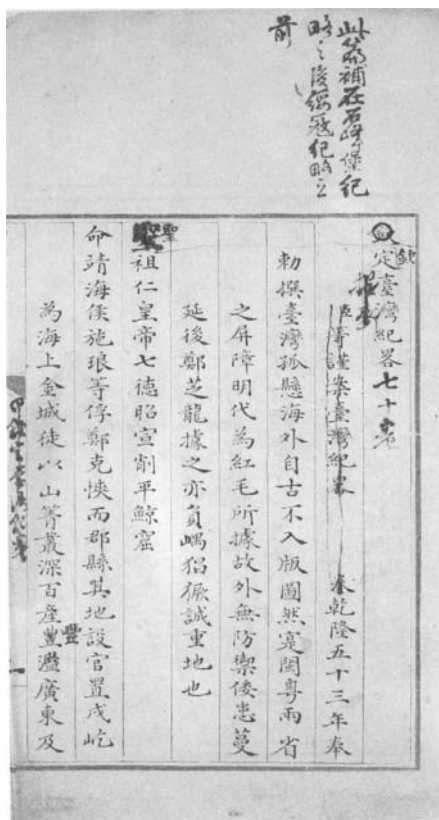
<sup>1</sup> 按浙本之刊行虽稍晚于殿本，但它所依据的底本却早于殿本之底本，故一般将殿本视为《总目》的最终定稿。知浙本称方中德《古事比》在前，殿本称陈禹谟《骈志》在后。

<sup>2</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九子部类书类存目三，下册，第1179页下栏。

<sup>3</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下册，第1156页上一中栏。从《骈志》被收入四库而《古事比》仅入存目，亦可看出四库馆臣对两书评价之高下。

<sup>4</sup> 见《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3册，第559—563页。此书书名，文

这一解释恐怕还值得斟酌。上文已经指出，天图稿本抄成于乾隆五十一年，而《钦定台湾纪略》系乾隆五十三年奉勅所撰，该书提要自然不会见于天图稿本底本，只能是后来补入的，并非因为改动较多而不得不重新抄写。至于此篇提要究竟补抄于何时，以及修改于何时，还需要花费笔墨做一点考释。



图三 《钦定台湾纪略》提要首页



图四 《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末页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考虑《钦定台湾纪略》的成书时间。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因《南巡盛典》告成而奏请议叙纂修人员，其中提到：“查方略馆于乾隆五十四年纂办《平定台湾纪略》告竣，臣等于进书摺内声明，俟《安南纪略》、《南巡盛典》告成后，再将纂修、誊录、供事人等奏请赏给议叙。”<sup>2</sup> 检文渊阁、文津阁及文溯阁本《钦定台湾纪略》书前提要，均称“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这应该就是此书的纂成进呈时间。<sup>3</sup>

渊阁本、文津阁本及文溯阁本皆作《钦定平定台湾纪略》。

<sup>1</sup> 李国庆：《影印纪晓岚删定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6页。

<sup>2</sup> 《军机大臣阿桂等奏〈南巡盛典〉告成并请议叙纂修人员摺》，军机处录副奏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270页。

<sup>3</sup> 据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六日《军机大臣奏遵查发下四库全书提要填写年月缘由片》

天图稿本补抄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原本也题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且篇首称“臣等谨案”云云，这显然不是《总目》提要的格式，而是库书书前提要的格式。这种情况应当作何解释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题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抄本，线装八册，不分卷。每半叶八行，行廿一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全书无通贯页码，每篇提要页码自为起迄，其实是以若干篇书前提要汇编而成的。今存提要105篇，包括经、子、集部各若干种，独缺史部。<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提要都是严格按照四库书前提要的格式抄写的，末句一律为“乾隆 年 月恭校上”，年月皆留空待填。据我判断，这是由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的四库书前提要底本，每篇提要至少应抄录七份，供七阁全书采用，当每种书抄校完毕后，只需将这些业已按照统一格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年月即可。补入天图稿本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想必就是这么个来历。不过，与其他书前提要底本皆空缺年月未填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书为四库官修书，修成后即同时抄入内廷四阁全书，故翰林院抄写的书前提要底本已按照该书的纂成进呈时间填写了年月。

那么，为何这篇提要原来所题的“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又被墨笔涂改为“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呢？我估计这篇提要被补入天图稿本的时间，正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左右。大概当时某位誊录监生按照总纂官的要求找来一份翰林院抄写的书前提要补入其中，但因此书书前提要底本卷数留空未填，于是又根据另一种书前提要补入卷数。而这“另一种书前提要”，估计是出自当时刚完成覆校的南三阁全书。南三阁全书的覆校工作始于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至五十五年六月才基本完成，<sup>2</sup> 当时南三阁书仍贮存于武英殿内，取校最为方便。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可以知道，成书较晚的四库官修书，大都是在此次覆校时才被补抄入南三阁的，《钦定台湾纪略》可能就是如此，因此“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应该是它抄入南三阁的时间。补入天图稿本的《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想必就是根据某种南三阁书前提要增补卷数，并将提要底本的“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依书前提要涂改为“乾隆五十五年七月”。然而因为这不符合《总目》提要的体例，所以后来又被总纂官删去此句。

通过以上考证和分析可知，《钦定台湾纪略》提要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左右补入天图稿本的，而总纂官对这篇提要所做的删改，当然更是在

---

称：“向来缮校各书，所写年分均系按照各呈进年分填写，从前进过一、二、三分书均系如此办理。”（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774页）

<sup>1</sup> 该抄本目前尚不为学界所了解，此承苗润博君相告。

<sup>2</sup>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22—225页。

此之后了。天图稿本中目前可以考知的修订内容，这是时间最晚的一条。

《四库全书总目》早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即已纂成初稿，并于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但此后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修订过程。天津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使学界得以了解此书后期修订过程的若干关键环节，对于进一步探索殿本、浙本的版本源流也不无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给予足够重视。

——原载《文史》2014年第4辑